

论日本文化二元特征及其成因

黄 华

(内江师范学院 监审处, 四川 内江 641112)

[摘要]日本文化的二元特征,在文化模式上,外在开放性与内在封闭性共存;在文化规范上,内聚性和排他性兼有;在文化心态上,自卑感与优越感并存。由于日本的地理生态环境和“边缘地带”文化交流模式,日本人的生存方式与特殊的“文化内嵌”形式,形成了日本文化二元性的特征。

[关键词]日本文化;二元特征;文化交流;生存方式

[中图分类号]G13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4-0128-04

当我们一走近日本文化,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其二元性或二元结构。几乎从日本文化的每一构成层面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二重性,诸如日本文化的开放性与封闭性,自卑感与优越感,内聚性与排他性,固守传统的保守性和好奇的进取精神等等。如果我们再继续细究这种二元性的形成,又会发现,这矛盾的两个侧面:一方面被外来文化强烈的同化,另一方面则是自身的复兴和强有力的肯定。我认为日本文化的二元性及其和谐的结合,正是日本文化的特征。下面试从文化学角度来阐释日本文化的二元特征及其成因。

一、日本文化的二元特征

(一) 文化模式:日本文化的外在开放性与内在封闭性

日本文化的模式,我们可用对外的开放性与对内的封闭性来概括,这是日本文化形态发展的基本形式。

纵观日本文化的发展史,日本文化始终取一种对外开放的性格,敞开大门积极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古代日本主要是依靠吸收中国的文化,来丰富、发展自己的文化,对中国文化实行全方位的开放,以至于使日本的传统文化表现出浓烈的中国文化的色彩,人们常常把日本的传统文化说成是古代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始于绳纹时代后期。其时,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通过朝鲜半岛先后来到日本列岛,给日本带来了稻米,铁器和青铜器。金属文化和稻作农业的传入,一方面使茹毛饮血的日本人脱离了原始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其拜倒在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脚下。这样,日本在形成自己的文化之初,就奠定了其文化的对外开放性的特征。

公元五、六世纪以后,随着日本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度更加扩大,从吸收文化器物发展到吸收文化制度和观念。据传在公元五世纪初的应神天皇十六年,百济人王仁将《论语》传入日本,儒学开始传入日本。紧随儒学之后,印度佛教也经中国传入日本。

到圣德太子时,许多贵族都以习汉文为时尚,达到了研习诸典籍无不通晓的地步。以这种全方位开放为文化背景,出现了圣德太子依据儒、佛原理制定的官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这些文件都洋溢着浓厚的儒学色彩,如十七条宪法便强调“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第十二条)、“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地载,四时运行”,与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如出一辙。即便是“宪法”文体所用的四字句,也是受中国六朝时代流行的“四六骈体”的影响所致。被视为日本文化发展里程碑的大化革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日本文化开放发展的产物。当时革新的智囊高向玄理,僧旻,都是从唐朝留学回国的,他们所实行的新政,也基本上以隋唐制度为蓝本,例如,二官八省制是仿唐的三省六部制,班田收授法是取法唐的均田制,《近江令》《养老令》等律令格式,则直接参照唐的《武德令》,《贞观令》等等。

到了近代,日本文化的发展,又经历了两次开放,一次以1868年发生的明治维新为标志,一次则以1945年的战后民主改革为主要内容。在明治维新之初,日本政府发布的治国大纲——“五条誓文”明确提出了“求知识于世界”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日本文化转而对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全面开放。在明治政府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放”三大政策的指导下,从1868年到1890年,日本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学术思想乃至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有选择地学习和移植了西方文明,在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建成了近代日本资本主义文化,并使日本很快成长为世界五强之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受到了美国的占领,美国在占领期间,对日本文化是实施了重大的外科手术,大量地移植了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制度。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日本对美国的占领及随之而来的改造,表现出了良好的合作态度。从文化角度而言,不能不说是日本文化本身的开放性使然。

• [收稿日期]2007-04-03

[作者简介]黄 华(1964—),男,四川简阳人,内江师范学院监审处。

日本文化以一种罕见的开放态度,在其历史活动中,先是吸收了中国的汉文化,特别是先秦孔儒的实践理性精神,后又消融了西方欧美文化,铸成了本身的开放机制。然而,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并没有使其成为一锅煮的大杂烩,在其对外开放、广泛吸收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内在的文化容纳选择机制和交融、同化过程,这从相反的方面铸成了日本文化的封闭性。关于这一点,日本精神的主要体现——神道教是很好的例证。

神道教是日本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精神的体现。在佛教传入之前,神道教与日本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仅是一种自然、精灵崇拜的原始信仰形态,^[1]包括太阳、山脉、树木及生殖等自然现象都作为氏族或部落的图腾受到崇拜,而且在人和自然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人的祖先同样受到崇拜。这种原始的信仰形态,同其他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一样,是简单而带任意性的。奇怪的是,日本的这种原始信仰形态并没有像其他民族的图腾崇拜,随着氏族公社的瓦解而自然消亡,相反在儒学和佛教传入后,获得了飞跃般的发展。首先神道与天皇制的政治统治形式结合起来,成为天皇制的理论依据之一。这主要体现在八世纪初期完成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其次,神道在佛教这一成熟的宗教形式的刺激下,开始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摆脱了原始的传说性质。平安时期是基于神佛一体观的“本地垂迹说”,到镰仓时期,正式出现了伊势神道和吉田神道。在吉田神道的经典《唯一神道各法要集》中,特别突出地强调了神道的特殊性。神道几乎无所不在,故为“纯一无杂”“唯一神道”。本来神道所用以阐发理论的概念,大都来自于中国的儒家经典和佛教原理,然经其阐发之后,神道竟成了“万法之根本”,儒佛则统统处于次要的地位,神道理论由是形成。至江户时代以后,神道经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的努力,更成为一个封闭的复古神道体系,它排斥一切外来的价值观念。近代以后,神道被定为国教,整个理论充斥着敬神爱国、崇祖忠皇的迷信忠君思想,不仅使神道的封闭性达到了登峰造极,而且使日本文化也完全与世界文化的发展相脱离,置于对立的地位。

可见,儒佛等外来的宗教,虽也存于日本,但它们是经过选择、改造之后,以日本型的儒佛形态而存在,它们在日本,仅是作为一种借用的“技术”,起着调整和培养日本人的某种心态的作用。从根本上说,他们受神道价值观念的支配,服务于神道。

人一方面创造了文化,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被文化塑造着,所以人的心理素质、风俗习惯也常常反映着文化的特点。日本人的日常活动和习惯,作为一种文化行为或者活动就体现了日本文化的封闭性特征。关于这一点,大量的研究日本人的著作几乎都提到了。如《日本近代成功的启示》就提到了,日本人在接待外国人问题上,从不把外国人当成推心置腹的伙伴,往往是以异常客气、礼貌的方式敬而远之。如果一个外国人要想进入日本人的生活圈子,那会遇到许多无形的障碍。例如在一般的交往中,日本人可以请你在高级餐厅聚餐,谈笑风生,但是他们绝不会请你到他的家里去看看。如果一个外国人对日本社会了解较多,又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他就会被视为“可疑的外国人”,受到戒备。^[2]

上述日本文化的封闭性是在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而开放与封闭二者并无矛盾。开放性使日本文化始终表现出好奇的进取精神,封闭性又使日本文化在与外界交流的情况下,仍能固守自己的传统,迷恋传统文化,日本人固守传统的劲头如同“守财

奴!”^[3]日本文化正是在这个悖论中获得迅疾的发展。

(二)文化心态:自卑感与优越感并存

美国人类学家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花与刀》一书中,将日本文化说成是“羞耻感文化特征的形成,一方面与日本人的荣辱生死观有关,另一方面与日本文化的‘自卑感’也有很大关系。自卑感使日本人殊言自我,甚至可以达到‘无我’的地步。

日本文化的自卑感早在古代日本文化形成初期就表现得淋漓尽致。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当时文化上还很落后的日本人,十分羡慕中土教化,乃携大量“牲口”(奴隶)来讨好高攀中国皇帝,并祈求中国皇帝对他们的赏赐。回国后,他们便利用中国皇帝的赐品,狐假虎威,在列岛上以老大大自居,甚至来自中国大陆的舶来品:“镜、剑、玉”,后来竟成了日本天皇用以表现自己权威和地位的三种“神器”。对中国的毕恭毕敬与回国之后的大肆炫耀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一种典型的自卑感。至近代以后,随着西势东渐,日本又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所倾覆。一方面他们拜倒在西方文明的脚下,打出“脱亚入欧”的旗帜,走欧化的道路,对西方列强在日本的强权百般忍让,甚至不惜把自己打扮成欧洲人,演出了一场“鹿鸣馆”的闹剧;在另一方面,他们又用从欧洲学到的东西来向东方国家炫耀,对东方国家大动干戈。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就在1871年寻求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机会,在其欲望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转面向朝鲜挑衅,逼其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此后,日本更是不断地向亚洲国家显示其优越感。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自卑感与优越感往往是同时并存的,是一物的两种面孔。因为自卑感会经常地造成一种紧张状态,人不可能长期地忍受这种焦躁不安的状态,因此,为了达到内心的平衡,人们会从相反的方面,用一种优越感来自我调解,这种优越感有时是客观存在,但更多的时候是人自己杜撰出来的。早在古代,日本在向隋唐称臣的同时,就建立起了自己对朝鲜半岛各国的大国地位,模仿中华帝国的册封体系,令朝鲜半岛各国向其称臣纳贡。为了掩饰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中的卑下地位,公元608年圣德太子派使来隋时,将其递交的国书写作“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明显地表现出了一种对等的大国地位。这种优越意识在神道教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佛法为万法之花果,儒教为万法之枝叶,神道教为万法之相本,彼之二教,神道教之分化也。”无根无以枝叶,也无以花果。所以神道教高于其他二教,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感。

进入日本近代,日本文化的优越意识几乎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经过发愤图强,大量移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很快跻身于世界五强之列。以此为背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些日本的文人就大谈“日本主义”,相信自己是天下人类中“优等民族”,“神土国家”,极力宣扬所谓日本精髓“大和魂”。^[4]以自己杜撰的神话来装饰自己,掩饰内心的自卑,公然要“以日本化、世界化的亚细亚思想,启蒙现在仍然处于低级阶段的”欧美国家,以日本所代表的东方文化代替已经走到“欧罗巴道路的尽头”的西方文化。这种自卑感和优越感并存的状况,制约了日本文化的其他特征。

(三)文化规范:内聚性和排他性兼有

文化心态的外化,一般是借助于文化行动,而对文化行为的制约则是由文化规范来实施。所以文化规范是文化行为的判断标

准,直接体现文化心态的原则,使得其某一文化行为与另一文化行为区分开来。日本文化中自尊自大的优越感和“小家子气”的自卑感,使其文化规范鲜明地表现为内聚性和排他性原则。

规范性的东西一般是体现于其所制约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行为。在文化观念上,让我们仍以神道教为例。神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对天皇及其祖先的神化,这种崇拜后来又演化出所谓的“日本魂”、“大和魂”的观念。在战前它作为一种民族意识充斥日本,是日本精神的最高体现。战后,虽然神道教与政府分离,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下降,但作为一般意识形态,仍在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神道教、大和魂使日本人在接触到外来文化时,自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向心力和内聚力,与此相适应也必然会产生排斥力。

在文化行为上,我们以下述两例作说明。其一,据梁策《日本之谜》说,他在日本曾遇到一老妪,当这位老妪得知他是中国人时,连说:“对不起,真是对不起”,“过去的战争真是对不起中国。”^[5]这位日本老妪的言行是不自觉的,属于日本文化中的文化行为,这一文化行为反映出日本人常常把个人紧紧地和集体联系在一起。很多研究日本国民性的专家将之称为“集团意识”。其二,罗伯特·怀特古在《菊花与棒球棍》一书中写到这样一件事,外籍运动员斯宾塞长期旅居日本,并效力于日本阪急棒球队。尽管斯宾塞有良好的技术,但由于棒球队的投手故意不与他这个外国人合作,致使斯宾塞无法获胜,而其对手日本人野村则获得了三连冠。两个事例,前者体现了内聚性,后者则是排他性的体现。所以“日本人总是把‘我们’与‘他们’即日本人同其他各国人民之间的界限分得很清楚”^[6]这些是由日本文化规范内聚性和排他性原则所使然。

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和高速发展,在世界引起轰动,尤其令各国经济学家感到诧异的是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日本式企业管理的特点突出表现在日本企业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和企业工会,他们构成了日本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不可缺少的三个有力支柱。然而如果透过这种制度的外表,埋在其深层的却是“集体主义”的经营思想。“集体主义”把企业看成是一个大家庭的命运共同体,企业中的每个人(包括最高经营者在内)都是这个共同体的一员,企业在与外界接触时,以一个团结整体的面貌出现。如在日本,一对新人成婚,如果丈夫在朝日啤酒公司工作,而妻子在三得利啤酒公司工作,那么,在当天的婚宴上,男方的亲朋好友一定是喝朝日啤酒,而女方的酒席上则一定是三得利啤酒,集体主义是不能因私人情感而模糊或晃动的。^[7]正是这种集体主义成功地支撑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而集体主义在日本的形成,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企业管理方式本身是日本文化的产物,集体主义是日本文化规范内聚性或排他性的体现,所以欧美很多企业家经济学家惊于“日本旋风”而群起模仿却无效果一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日本文化二元特征的成因

(一)日本的地理生态环境和“边缘地带”文化交流模式

日本文化二元特征的形成,依赖于该民族的历史发展;而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反过来又影响了该民族的历史发展,这两个几乎不分先后次序的过程是交相作用的,既有历史性又有共时性。为了追溯这两个交互作用的过程,我们把逻辑思维的始点落到历史发展的起点。依据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人的学说,人类历史的起点,使人与自然的对立。由于地球上各地区的人具有同

一的特征和属性(所以才称为人),而不同的只是自然环境。所以一个民族形成时所处的地理环境对于该民族文化式样和素质的产生起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列宁所说:“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的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8]

从地理上看,日本是个岛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端,东临太平洋,西隔日本海与大陆相望。在地质构造上,日本列岛属于环太平洋造山带,所以列岛山地很多,北海道和本州北部的山脉为南北走向,九州、四国和本州南部的山脉成东西走向,两者回于九州中部,称“中央山结”,山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76%以上。

日本列岛地理环境的另一个特点是,全境火山带纵横,九州的雾岛火山带,本州的白山火山带、富士山带,北海道的千岛火山带、那顺山火山带等,计有七处火山带,有“火山国”之称。由于火山频发,全国地震频仍,故又有地震国之称。

从生态环境上看,日本平原很少,仅占全国总面积的25%,且大都分布于山间沿海地带。列岛河流短促湍急,日本最长的河是信浓川,其长不过367公里,简直无法与埃及的尼罗河、中国的黄河相提并论,缺乏古代大河流域文明的条件,加之气候上经常遭受台风的袭击,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十分的恶劣。

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日本先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恶劣的环境,不利于古代文明的发展。这一状况,使日本旧石器时代的文明毫无光彩,不仅在时间上远远迟于其他文明,而且在发展的程度上异常落后,甚至在其所毗邻的中国早已进入发达的封建社会时,日本文化仍在原始状态中徘徊。极端落后的文化,在接触到先进的文化时,必然会产生一种自卑感,进而会积极移植先进文化,日本文化中自卑感,开放性的特征几乎在日本文化形成之初就产生了。

其次,与之相适应,产生了“边缘地带”特殊的文化交流模式。正如作为自然存在的人,同时不可避免地是作为文化载体而存在一样,作为文化自然基础的地理环境,也必然同时是某一文化存在的文化环境。日本的文化环境其显著特点可以“边缘地带”来概括。

“边缘地带”是战后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兴起的“依附学派”的一个基本概念。我们所使用的边缘地带的含义是,一个文化处在另一种发达的中心文化的边缘。从世界文明发展史来看,文化中心和边缘地带是客观存在的。古代史上有黄河流域文明,两河就与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这五大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和辐射区,环绕在文化中心边缘的便是边缘地带。边缘地带的特征,(1)与文化中心的时间距离,即文化的落后性。(2)与文化中心的空间距离,即文化的独立性。(3)文化的向心性。(4)文化内部的巨大差异。具有上述特征的边缘地带,在文化的交流发展中存在着独特的方式。与文化中心的时间距离,意味着边缘地带文化的落后性,从而决定了边缘地带文化的向心性;与文化中心的空间距离,保证了边缘地带的文化在与中心文化接触中的独立,即没有被同化;模仿、学习先进中心文化的结果,导致了边缘地带文化的不平衡性。

日本文化的发展符合边缘地带的文化交流模式。第一,在日本正式接触到大陆文化之前,日本的文化发展是异常缓慢的,这种落后性给日本提供了模拟效仿的机会。所以从日本文化发展史角

度来看,早期日本是处在中国内地文化的边缘,近代日本则处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边缘。日本文化的落后性使其在与中心文化的接触中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和内聚力;而依靠向心力的作用,又使日本文化形成了突出的进取,开放的性格。所以日本文化在文化的选择机制上表现为一种定向选择,即在主观上的模拟选择。先是以中国为模拟对象,很不能把日本文化制成中国版。从圣德太子到大化革新无一不是照搬中国的文化制度,这种风尚甚至到江户时期仍一如既往,如著名的儒学者藤原惺窝就曾说过:“呜呼!不生于此邦之上世,可谓不遇时!”^[9]到了近代,日本又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积极向先进的欧洲文化看齐,这些是其采取定向选择的结果。

第二,日本列岛和大陆之间被日本海隔离开来,这道大自然的防线,成功地保证了日本文化的独立发展。尽管日本接受了中国的文化,但日本却不像大陆国家朝鲜那样,曾直接受到中国的统治,日本保证了人种的完整统一和文化的独立发展。因此,日本文化虽然跟朝鲜文化一样,受到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的程度和深度,都跟后者明显的不同。^[10]由此,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文化在自卑感内聚性和开放性的另一面,会形成优越感排他性和封闭性,即日本采取定向选择的结果,很快地移植了中心文化而赶超上来,日本人种的独立、文化的完整统一自然会使日本人从自我中寻找答案和优势。那么封闭和开放、自卑和优越、内聚和排他这矛盾的二项在日本文化发展是如何有机和谐地组合在一起的呢?

(二)日本人的生存方式与特殊的“文化内旋”形式

作为居住在“边缘地带”的日本人,其生存方式的最大特点,是经常受到来自文化中心的文化冲击或刺激,这种刺激以不直接接触为限。这样,在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保持了独立发展,无论是其稻作农业还是生活习俗,都与大陆中国有很大的不同。

边缘地带日本人的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特征,决定了日本文化在与外来文化交流中的独立发展,在文学上这一现象被称为“文化内旋”。“文化内旋”原意为“卷入、复归、包容、内部复杂化”,后为吉尔斯在 1936 年所著《农业的“内旋”——印度尼西亚生态变化的过程》和塞维斯在《文化进取论:实用理论》中系统加以应用,并上升为文化学的概念。它指一民族文化在新的条件下,为维持既存结构,采取的自我调整和复杂化的过程。因此,内旋的条件是外来文化的刺激与吸收、融合,最后达到固有文化传统与新文化精神的和谐统一。

通过上述对日本人生活方式的分析,我们可知日本人的生活是独立发展的;在其独立发展中不断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这正符合文化内旋的条件,于是处在边缘地带的日本人在其历史活动中,不断地吸收融合外来文化,丰富发展自己的文化,铸成了文化内旋的运动形式。它一方面使日本文化在其发展中获得了大幅度的跃进,另一方面又使其保留了固有的文化传统。这是日本之能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结合的原因之一。在日本历史发展中,越是最发展的时候,传统文化就越突出,例如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为世界五强之一,但在文化传统上,日本却开始大幅度地从西欧文化回归东洋文化。战后,日本受到西方文化的大改造,但日本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发展自己的同时,又逐步地复活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文化内旋对日本传统文化的肯定和发展是日本文化封闭性、优越性、排他性产生的基础,它最终使日本文化在开放的系统中形成固守传统的封闭型;在自卑感的背后隐藏着优越感的因素;在对内团结的另一面形成排他性。于是,看起来是那么矛盾的两个方面竟和谐地并存于日本文化的统一体上,构成了日本文化鲜明的特征。

[参考文献]

- [1](日)安津素彦.神道和日本人[M].日本神社新报社,1986.28.
- [2]高增杰.日本近代成功的启示[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62.63-64.
- [3]陈伟.岛国文化[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2.201.
- [4]汪森,培柱.日本近代史上的沙文主义[J].文学集刊,1987,(4).
- [5]梁策.日本之谜[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9.
- [6](美)埃德温·欧·赖肖尔.日本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444.
- [7]曾世潮.文化战略[M].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10.
- [8]列宁全集(第38卷)[M].人民出版社,1958.459.
- [9](日)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3[M].东京岩波书店,1975.53.
- [10](日)梅祥志夫等.日本文化的结构[M].讲谈社,1972.17-22.

(责任编辑:朱德东)

On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 culture and its cause

HUANG Hua

(Supervising Department, Neijiang Normal College, Sichuan Neijing 641112, China)

Abstract: In cultural mod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 culture embody its openness outside and closeness inside, have both cohesive and exclusive character in 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and have both a sense of inferiority and a sense of superiority in cultural psychology. Because of Japan's geographic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exchange mode of "marginalized zone", the living mode and special form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Japanese form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 culture.

Keywords: Japan culture; dual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exchange; living mode